

中部崛起:基层政府的执政行为 与农村的经济发展

——湖北农村基层政府执政行为问卷调查分析

黄文平

(浙江财经学院经济系 310012)

内容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实施沿海地区开放、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增长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亟需认真对待和妥善解决。因之,促进中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中部崛起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成了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笔者通过实地考察湖北农村基层政府的执政行为和农村居民的生活境况,获取了隐匿于统计数据背后的真实情况。文章认为,现阶段我国农村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已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需要。文章的研究,对振兴我国中部地区农村经济以及解决“三农”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区域经济 “三农”问题 执政行为

中图分类号: F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1309(2006)2-0005-12

一、农村经济发展与中部崛起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一国经济的增长,往往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过程中实行的 (Francois Perroux, 1956; A. O. Hirschman, 1958; R. Vernon, 1966),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而言,就更是如此 (W. Arthur Lewis, 1954; Gunnar Myrdal, 1957)。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经济区域由工业较发达的北部地区和贸易较发达的东部地区,以及相对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地区组成,自美国建国以来一直到如今,南北差距和东西差距一直存在,并没有完全消失 (Jeremy Atack & Peter Passell, 1994)。在学术界,学者对此问题持不同态度。巴罗与萨拉·艾·马丁分别对美国48个州和日本47个县的增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证实了收敛的存在 (Barro-Sala-i-Martin, 1992)。此外,萨拉·艾·马丁对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的五个国家各自内部的地区间增长差异进行实证检验,也证实了收敛性的存在 (Sala-i-Martin, 1996)。

对中国经济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上的不均衡,各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的现象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Jian, Sachs和Warner利用中国1953年~1993年的统计数据研究了中国各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他们认为,自1978年农村经济改革开始,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收敛,且收敛程度在先行一步的具有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化的沿海地区尤为显著 (Jian, Sachs & Warner, 1996)。刘树成 (1994),

收稿日期: 2005-12-27

谷书堂和唐杰 (1994)等学者对该问题也持大体相近的观点。而袁钢明 (1996)、魏后凯 (1997)、于祖尧 (1997)、王绍光和胡鞍钢 (1999)对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总体上持怀疑态度。根据蔡昉和都阳 (2000, 2001)以及刘强 (2001)的研究,中国省际间的人均 GDP 增长趋同是一种有条件的趋同,除了地区因素外,人力资本、投资额和投资效率、贸易依存度、劳动力的区际迁移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等因素,都是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重要诱导性因素。

事实上,无论中国各地区间经济增长是否收敛,都说明了目前各区域经济体在增长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否则就不存在所谓收敛的问题了。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中后期,中央政府对以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实行政策倾斜,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期便全力打造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重点建设京津唐以及环渤海经济圈,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 年实施“振兴东北”的战略决策,这些都是中央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施非均衡战略的典型例证。而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和山西六省在内的中部地区,则成为“政策边缘化”区域,导致了所谓的“中部塌陷”。

统计资料表明,中部六省的国土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国的 10.7% 和 28.1%。其中,中部地区的耕地面积占全国的 18.9%,农村人口高达 2.44 亿,占全国农村人口的 31.2%。中部地区总人口和农村人口在全国的比例,大约都维持在 1/3 左右的水平,这表明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处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位置。而人均 GDP,1980 年中部地区人均 GDP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88%,1990 年下降到 83%,2003 年,进一步下降到 75%。1991 年~ 2000 年,东部地区人均 GDP 年均增长速度为 9.78%,中部地区为 8.43%,西部地区为 9.18%。^①“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而发展速度落后于西部”,这就成了当前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

笔者以为,与其他区域经济体比较,造成中部地区目前这种经济发展的尴尬境况,体制、政策等因素固然不可或缺,而自然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中部地区作为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对保障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具有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中部地区农村人口占该地区全部人口的 67.6%,因之,更快促进中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就成了中部崛起的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以中部地区的湖北省为例,湖北省国土面积 18.59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 1.94%;2004 年末全省人口 6016.1 万,占全国总人口的 4.63%。其中,城镇人口 2627.8 万,占全省人口的 43.7%;农村人口 3388.3 万,占全省人口的 56.3%。1990 年~ 2001 年,湖北省 GDP 总值年均增长 11.6%,与同一时期中部其他地区比较,河南 (11.3%),湖南 (10%),江西 (9.8%),安徽 (11.9%),山西 (8.8%)^②,大体属于同一发展层次。

表 1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湖北与东部五省的比较^③

单位: 元

年份	湖北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	山东	年份	湖北	江苏	浙江	福建	广东	山东
1990	671	959	1099	764	1043	680	1997	2102	3270	3684	2786	3468	2292
1991	627	959	1099	764	1043	680	1998	2172	3377	3815	2946	3527	2453
1992	678	1061	1359	984	1308	803	1999	2217	3495	3948	3091	3629	2550
1993	783	1267	1746	1211	1675	953	2000	2269	3595	4254	3231	3655	2659
1994	1173	1832	2225	1578	2182	1320	2001	2352	3785	4582	3381	3770	2805
1995	1511	2457	2966	2049	2699	1715	2002	2444	3980	4940	3539	3912	2948
1996	1864	3029	3463	2492	3184	2086	2003	2567	4239	5389	3734	4055	3151

如果将湖北农村居民与东部五省(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更为明显的差距(参见表1)。1990年~2003年,湖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0.8%,而同一时期,江苏为12.1%,浙江为13.1%,福建为12.9%,广东为11.0%,山东为12.5%。众所周知,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上的些微差距,其累积效应十分巨大。倘若比较绝对水平,湖北农村居民2003年的人均纯收入尚不及浙江1995年的水平,两者差距近10年,即便与东部发展水平最低的山东省,也有近5年的差距。而且,按目前的发展趋势,这种差距在短期内还会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为更清楚了解统计数字背后的真实,笔者对湖北农村地区进行了为期2周的实地调查。

二、问卷调查结果分析(一)

笔者于2005年1月25日至2月8日在湖北省天门市胡市镇与汉川市垌塚镇交界处的农村进行一次地方政府执政行为(包括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与公共政策的民意调查。^④这里,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土地肥沃,湖泊众多,尤其天门市,还享有全国棉花“百万担”的荣誉称号。此外,天门和汉川两市,行政级别虽属县级市,但两地的中学教育水平,尤其高考升学率之高,在湖北乃至全国都有很高的知名度。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天门就以“三花”(棉花、塑料花和教育之花)闻名全国。这次调查^⑤,共走访了162户从事农业种植、外出务工或经商的农村家庭。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参见下列表2。在162名被调查者中,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的有69人,外出务工者35人,经商16人,学生28人,乡村教师5人,乡镇干部3人,乡镇文员3人,退休返乡养老者3人。^⑥问卷调查表的内容共分4个部分,分别为:政府形象调查、政策执行调查、政策信息调查和生活状况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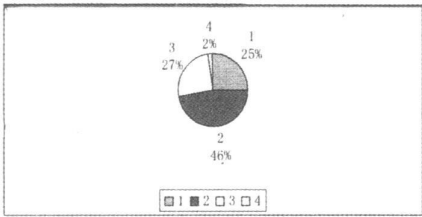
表2 调查样本信息

项 目 性别	样本数 (人)	最大 年龄 (岁)	最小 年龄 (岁)	平均 年龄 (岁)	家庭 平均 人口 (人)	家庭最 高平均 纯收入 (元/年)	家庭最 低平均 纯收入 (元/年)	样本 平均 年龄 (岁)	样本家 庭平均 人口 (个)	家庭平 均纯收 入 (元/年)	人均 纯收入 (元/年)
男	134	82	17	38.6	4.2	36000	4000	35.9	4.3	12345.7	2871.1
女	28	50	17	23.1	4.3	30000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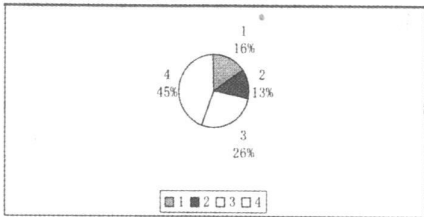
1. 当地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调查

(1)政府权力调查:在162名受访者中,41人认为当地政府拥有非常大的权力,75人认为政府拥有比较大的权力。两者相加,有71%的受访者认为政府权力比较大。而认为政府权力适度的有43人,比例为27%。仅3人认为政府的权力太小,占总数的2%(参见图1)。

(2)工作态度调查:在162名受访者中,26人认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态度亲切和礼貌,比例为16%;21人认为态度粗暴,42人认为态度冷淡,两者相加,比例为39%;73人认为态度一般,比例为45%(参见图2)。



1: 非常大的权力; 2: 比较大的权力
3: 适度的权力; 4: 太少的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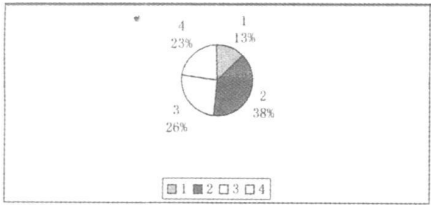
1: 礼貌和亲切; 2: 粗暴; 3: 冷淡; 4: 一般

图 1 政府的权力类型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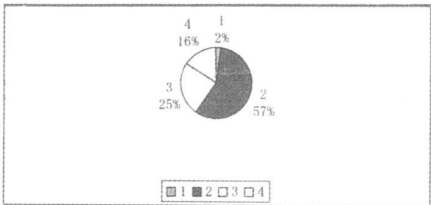
图 2 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

(3)工作效率调查: 在 162名受访者中, 21人认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较好, 比例为 13%; 62人认为工作效率一般, 比例为 38%; 42人认为工作效率勉强可以接受, 比例为 26%; 37人认为工作效率低, 办事拖拖拉拉, 比例为 23% (参见图 3)

(4)政府公正调查: 在 162名受访者中, 4人认为政府处理所有问题都公道, 比例为 2%; 92人认为政府在多数问题上都能做到秉公办理, 比例为 57%; 40人认为政府只在少数问题上公道, 比例为 25%; 26人认为政府只在极少数问题上才公道, 比例为 16% (参见图 4)



1: 很高; 2: 一般; 3: 勉强可以; 4: 拖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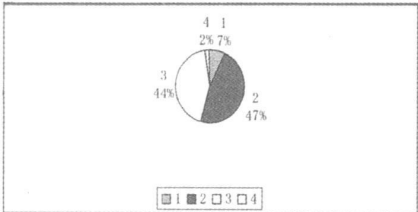


1: 所有问题上公道; 2: 大多数问题上公道
3: 少数问题上公道; 4: 极少数问题上公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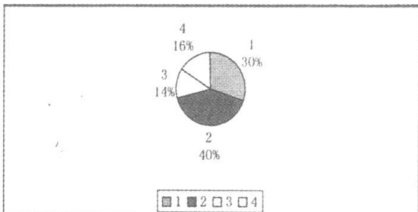
图 3 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

图 4 政府公正性调查

(5)工资水平调查: 在 162名受访者中, 12人认为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太高, 75人认为工资水平比较高, 两者相加, 比例为 54%; 72人认为工资水平合理, 可以接受, 比例为 44%; 3人认为工资水平太低, 比例为 2% (参见图 5)



1: 工资水平太高; 2: 工资水平比较高
3: 工资水平一般; 4: 工资水平太低



1: 很好; 2: 一般; 3: 差; 4: 很差

图 5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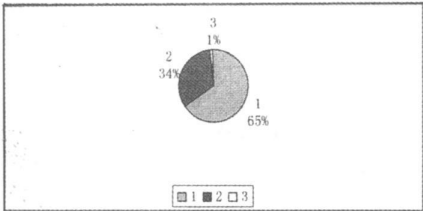
图 6 政府形象比较

(6)政府形象比较调查: 在 162名受访者中, 49人认为当地政府比本省其他地方政府的形象要好, 比例为 30%; 65人认为差不多, 比例为 40%; 48人认为当地政府比本省其他地方的政府形象要差, 比例为 30% (参见图 6)

2. 当地政府在政策执行方面的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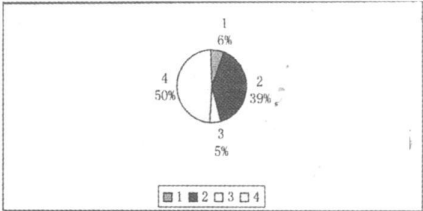
(1)政策落实情况调查: 在 162名受访者中, 105人认为中央或省市政府颁布的政策能基本落实, 比例为 65%; 55人认为政策大多没有落实, 比例为 34%; 2人认为政策全部没落实, 比例为 1%; 没有人选择政策全部落实 (参见图 7)。

(2)政策没落实的原因调查: 在 162名受访者中, 6%的人将政策没落实的原因归于政策错误或政策不合理, 39%的人认为是基层政府官员不称职或腐败造成了政策没落实, 3%的人认为是地方民众没有配合好政府的工作, 而 50%的人认为上级政策本身是好的, 但下面的官员根本没执行 (参见图 8)。



1: 政策基本落实; 2: 政策大多数没落实
3: 政策全部没落实

图 7 政策落实情况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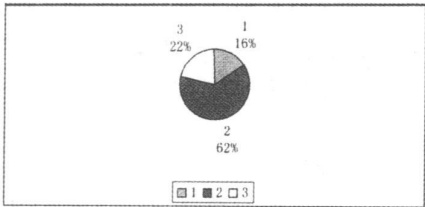


1: 政策错误或不合理; 2: 政府官员失职或腐败
3: 民众没有配合; 4: 政策好, 但下级官员没执行

图 8 政策没落实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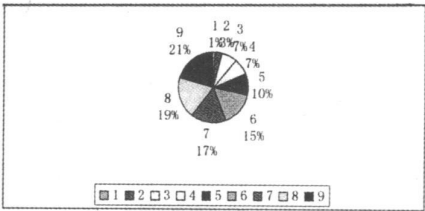
(3)政府在食品卫生检查和监督方面的调查: 在 162名受访者中, 26人认为政府官员比较称职, 比例为 16%; 101人认为表现一般, 比例为 62%; 35认为政府官员不称职或很不称职, 比例为 22% (参见图 9)。

(4)防止或惩治假冒伪劣产品的责任承担问题调查: 在日常生活中, 假冒伪劣产品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十分头疼的顽疾。在责任承担问题上, 调查结果表明, 1%的人选取公安机关, 3%的人选取法院, 7%的人选取检察院, 7%的人选取零售商, 10%的人选取批发商, 15%的人选取生产企业, 17%的人选取质量技术监督局, 19%的人选取工商管理部门, 21%的人选取政府部门 (参见图 10)。这表明受访者对该问题的看法比较分散



1: 比较称职 2: 表现一般 3: 不称职或很不称职

图 9 政府在食品卫生检查和监督方面的调查



1: 公安局 (派出所); 2: 法院; 3: 检察院
4: 零售商 (个体户); 5: 批发商; 6: 生产企业
7: 质量技术监督局; 8: 工商局 (工商所);
9: 政府部门

图 10 哪个部门应承担责任的?

3. 政策信息调查

(1)政策渠道调查: 在 162名受访者中, 6%的人经由小道消息, 8%的人通过互联网, 9%的人通过上级文件、会议和聊天的方式来获知政府政策, 10%的人通过亲朋好友, 15%的人通过收听广播, 19%的人通过阅读报刊, 33%的人通过看电视来获知政府政策 (参见图 11)。

(2)关注新闻、时事评论和法治类节目调查: 在 162名受访者中, 5人用于这类栏目的时间每天超过 2小时, 比例为 3%; 53人用于这类栏目的时间每天在 1小时至 2小时之间, 比例为 33%; 60人用于这类栏目的时间每天在半小时至 1小时之间, 比例为 37%; 27人用于这类栏目的时间每天在 10分钟至 30分钟之间, 比例为 17%; 12人用于这类栏目的时间每天在 10分钟以内, 比例为 7%; 仅有 5人没有关注, 比例为 3% (参见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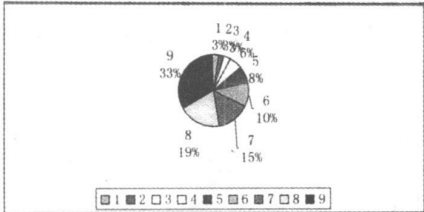


图 11 政策渠道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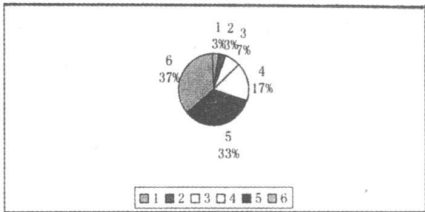


图 12 关注新闻、时事评论和法治节目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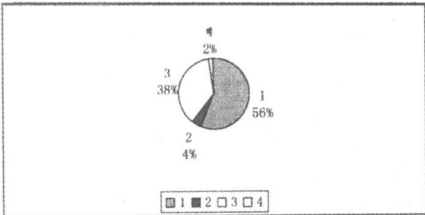


图 13 生活改善状况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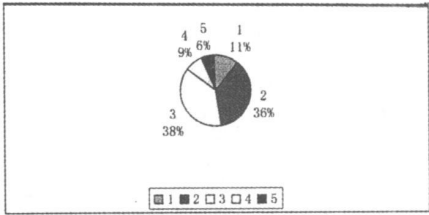


图 14 政策对收入的影响

4. 生活状况调查

(4. 1)生活改善调查: 在 162名受访者中, 90人认为自己生活有比较大的改善, 比例为 56%; 62人认为自己生活有一般的改善, 比例为 38%; 7人认为自己生活没有变化, 比例为 4%; 仅 3人认为自己的生活恶化了, 比例为 2% (参见图 13)

(4. 2)政策对收入的影响调查: 在收入影响方面, 162名受访者中, 18人认为政策极大地增加了自己的收入, 比例为 11%; 58人认为政策增加了比较大的收入, 比例为 36%; 62人认为政策增加了少量的收入, 比例为 38%; 14人认为政策对自己的收入没有影响, 比例为 9%; 10人认为政策降低了自己的收入, 比例为 6% (参见图 14)

三、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二)

上述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一), 分别从政府形象、政策执行、政策信息和生活状况等四个方面对湖北农村基层政府的执政行为和政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通过这次访谈式的抽样调查, 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只依靠逻辑推理和数据报表而无法获得的直觉信息。本次问卷调查, 透露了以下三个典型性问题或事实的信息:

第一,农村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问题。在笔者调查的地区,农民将当地政府的功能归结为“公粮、提留与计生”三个方面,而在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卫生保健和社会优抚等领域,则基本处于一片空白。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在乡村道路、饮用水以及与之相关的环境保护等方面,情况更不乐观。据当地居民反映,目前该地区的乡村级泥土路,较之前些年更差,不仅道路两旁的树木全部被砍伐一光,而且路面更窄、更加坑洼不平。同时,镇医院和乡村各级卫生所,医疗条件十分落后,同以前相比有明显的退步。这是两类决然相反的现象:在私人方面,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而在公共方面,集体资源极为匮乏,个人无法获得基本的医疗保健服务和清洁的饮用水。农村的公共产品,无论在品种、规模和质量方面都大大落后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这无疑是经济学上典型的“公共地的悲剧”(Hardin, 1968)。因此,转变农村基层政府职能,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成了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民生活的关键。

第二,农村居民生活状况提升与自然环境的协调问题。因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孔雀东南飞”的状况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这在湖北农村地区已是司空见惯之事。由于大量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或从事个体经营,当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是些老弱病残之人,而留下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壮实劳动力在整个青壮年群体中的比例不足三成。从调查结果看,当前农户人均年纯收入约为2871.1元,稍高于2003年湖北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566.8元和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622.2元的平均水平。^⑦值得强调的是,受访者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或个体经商而非农业种植,即使受访者本人从事农业种植,但其子女通常都有在外打工的经历。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以及越来越多年轻人走出农村到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寻找工作,这就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农村居民的衣、食、住、行的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相当部分居民住进了2~3层的小楼房,电视机、冰箱、收录机等家电产品几乎已进入每个农村家庭;另一方面,电子产品、塑胶制品、玻璃器皿等产品的大量使用和随意处置,超过了自然的净化能力,损害了农村的生态环境。

第三,信息传递、政策执行与政策预期问题。根据笔者的调查,73%左右的农村居民通过电视、广播、报纸以及互联网等传播媒介来获得政府政策以及其他外界信息,仅25%左右的农村居民通过闲聊、开会、小道消息、亲朋好友等形式来获得政府政策以及其他外界信息。这样,中央政府以及省市政府有关“三农”问题的政策,农村居民都能够迅速、便捷的获知。因而,基层政府是否执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执行上级政策,对农村居民而言,其信息不对称程度就会极大缩小。根据问卷统计,对当地政府承诺的信任度,仅2人安全相信,比例为1%;相信政府能兑现过半以上承诺的有75人,占总数的46%;而85人不相信政府能兑现自己承诺的一半,比例为53%。这意味着,超过半数的农村居民,已形成对一个不信任当地政府会遵守自己承诺的预期。这是任何一个关注和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深刻反思的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构建了一个我国农村基层政府执政行为评价的离散因变量模型(Models with Discrete Dependent Variables)。其中,以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执政行为的评价(EGB)为因变量(被解释变量),以政策落实程度(DPR)、政策对收入的影响指数(PEI)、家庭人均年收入(AIN)以及政府承诺的信任指数(BIP)等四个变量为自变量(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分别按以下方式赋值:

被解释变量:基层政府执政行为评价(EGB),按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很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等分为六个等级,各级按1~6分别赋值,具体如下:

非常满意: 1	不满意: 4
比较满意: 2	很不满意: 5
一般满意: 3	非常不满意: 6

解释变量之一: 政策落实程度 (DPR),按全部落实、基本落实、大多数没落实以及全部没落实等分为 4个等级,各级按 1~ 4分别赋值,具体如下:

- 全部落实: 1
- 大多数没落实: 3
- 基本落实: 2
- 全部没落实: 4

解释变量之二: 政策对收入的影响 (PEI),按增加了非常大的收入、增加了比较大的收入、增加了少量收入、没有影响、降低了收入以及降低了很大的收入等分为 6个等级,各级按 1~ 6分别赋值,具体如下:

- 增加了非常大的收入: 1
- 没有影响: 4
- 增加了比较大的收入: 2
- 降低了收入: 5
- 增加了少量的收入: 3
- 降低了很大的收入: 6

解释变量之三: 家庭人均年收入 (AIN),按照家庭纯收入除以家庭人口计算,考虑到与其他变量赋值的协调,笔者在回归分析时将收入单位适当扩大 (以千元为单位,这并不影响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之四: 政府承诺的信任指数 (BIP),把信任程度划分为 10个信任等级区间,每个区间有 10个百分点的间隔,按 1~ 10分别赋值,具体如下:

- 全部相信: 1
- [50% ,60%]: 6
- [90% ,100%]: 2
- [40% ,50%]: 7
- [80% ,90%]: 3
- [30% ,40%]: 8
- [70% ,80%]: 4
- [20% ,30%]: 9
- [60% ,70%]: 5
- 20% 以下: 10

在上述基础上,笔者建立离散因变量有序选择模型 (Ordered Choice Model):

$$EGB^* = x'\beta + \epsilon, EGB^* = 1, 2, 3, 4, 5, 6$$

表 3 有序选择模型中的因变量、指标变量及其概率值

EGB的取值	相应的 EGB^* 范围	EGB取该值的概率
1	$EGB^* \leq \gamma_1$	$F(\gamma_1 - x'\beta)$
2	$\gamma_1 < EGB^* \leq \gamma_2$	$F(\gamma_2 - x'\beta) - F(\gamma_1 - x'\beta)$
3	$\gamma_2 < EGB^* \leq \gamma_3$	$F(\gamma_3 - x'\beta) - F(\gamma_2 - x'\beta)$
4	$\gamma_3 < EGB^* \leq \gamma_4$	$F(\gamma_4 - x'\beta) - F(\gamma_3 - x'\beta)$
5	$\gamma_4 < EGB^* \leq \gamma_5$	$F(\gamma_5 - x'\beta) - F(\gamma_4 - x'\beta)$
6	$\gamma_5 < EGB^*$	$1 - F(\gamma_5 - x'\beta)$

这里, $x = (DPR, PEI, AIN, BIP)'$, β 为各解释变量待估参数所构成的列向量,因变量 EGB以及指标变量 EGB^* 之间的关系参见表 3。其中 $\gamma_1, \gamma_2, \gamma_3, \gamma_4, \gamma_5$ 和是根据指标变量 EGB^* 来定义 EGB时的临界值, x 是解释变量, β 是解释变量的参数 (x 和 β 都用列向量表示), F 为回归模型残差项的概率分布,这里取 Logit 分布。

根据已建立的有序选择模型,并应用计量软件 Eviews5. 0对 162个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表 4的结果。根据表 4,可以把模型写为:

$$EGB^* = 0.3862^* DPR + 0.08940^* PEI + 0.1846^* AIN + 0.1899^* BIP$$

表 4

有序选择模型的 Logit估计

Dependent Variable EGB Method ML-Ordered Logit (Quadratic hill climbing) Sample 1 162 Included observations 162 Number of ordered indicator values 6 Convergence achieved after 5 iterations Covariance matrix computed using second derivatives				
	Coefficient	Std. Error	z-Statistic	Prob.
DPR	0. 386158	0. 314791	1. 226712	0. 2199
PEI	0. 089398	0. 166371	0. 537345	0. 5910
AIN	0. 184644	0. 081594	2. 262963	0. 0236
BIP	0. 189861	0. 070257	2. 702364	0. 0069
Limit Points				
LIMIT_2 C(5)	- 0. 244284	0. 850529	- 0. 287215	0. 7739
LIMIT_3 C(6)	1. 625849	0. 809910	2. 007443	0. 0447
LIMIT_4 C(7)	4. 102813	0. 867374	4. 730153	0. 0000
LIMIT_5 C(8)	5. 873517	0. 936121	6. 274311	0. 0000
LIMIT_6 C(9)	6. 514492	0. 991844	6. 568062	0. 0000
Akaike info criterion	2. 638342	Schwarz criterion		2. 809875
Log likelihood	- 204. 7057	Hannan-Quinn criter.		2. 707987
Restr. log likelihood	- 213. 2846	Avg. log likelihood		- 1. 263615
LR statistic (4 df)	17. 15773	LR index (Pseudo-R ²)		0. 040223
Probability(LR stat)	0. 001801			

在表 4中,有 5个极限点(临界点)的估计值以及相应的标准误和概率值 V_1,V_2,V_3,V_4,V_5 的估计值分别是 LIMIT_2, LIMIT_3, LIMIT_4, LIMIT_5和 LIMIT_6 也就是说, $\bar{y}_1= - 0. 2443,\bar{y}_2= 1. 6259,\bar{y}_3= 4. 1028,\bar{y}_4= 5. 8735,\bar{y}_5= 6. 5145$

回归结果分析:

(1)从表 4中可以看到,各解释变量参数估计值的符号皆为正值,这意味着各解释变量对指标值的影响为正,即政策落实程度(DPR)、政策对收入的影响(PEI)、家庭人均年收入(AIN)以及政府承诺的信任指数(BIP)越大,那么落入相应 EGB 指标值(EGB^*)的概率也越大。换句话说,在其他变量不变时,如果政策落实的程度越低(DPR 值越大),EGB 的指标值(EGB^*)就越大,农村居民对当地政府执政行为不满意的概率就越高(对应地,满意的概率就越低);反之,如果政策落实的程度越高(DPR 值越小), EGB^* 指标值(EGB^*)就越小,农村居民对当地政府执政行为不满意的概率就越低(对应地,满意的概率就越高)。

同理,在其他变量不变时,如果政府政策对收入提高的影响越小(PEI 值越大),EGB 的指标值(EGB^*)就越大,农村居民对当地政府执政行为不满意的概率就越高(对应地,满意的概率就越低);反之,如果政府政策对收入提高的影响越大(PEI 值越小),EGB 的指标值(EGB^*)就越小,农村居民对当地政府执政行为不满意的概率就越低(对应地,满意的概率就越高)。

在其他变量不变时,如果居民对政府承诺的信任度越低(BIP 值越大),EGB 的指标值(EGB^*)就越大,农村居民对当地政府执政行为不满意的概率就越高(对应地,满意的概率就越低);反之,如果居民对政府承诺的信任度越高(BIP 值越小),EGB 的指标值(EGB^*)就越小,农村居民对当地政府执政行为不满意的概率就越低(对应地,满意的概率就越高)。

(2)这里,关键是对人均收入(AIN)系数估计值符号的解释。依直觉,人均收入越高的人,对政

府执政行为的满意度应该更高些,或者说对政府的施政持更为正面的看法。然而,在本模型中,无论是以家庭纯收入,还是以家庭人均纯收入,或者是各自相应的对数值进入模型,回归时的系数皆为正值。同时,AIN系数估计值也满足统计显著性要求。此外,把回归的Logit模型改为Normal或Extreme Value模型,AIN系数估计值的符号仍然没有改变。粗略地看,这似乎就是AIN系数的一个“悖论”。

其实,AIN系数的“悖论”,或者说不合常理,可以从调查样本信息和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的角度得到合理解释。我们知道,在受访的162名农户中,外出务工者35人,经商16人,两者合计共51人,占样本总数的31.5%,但这并不表示68.5%的其他受访者家庭没有外出务工或从事个体经商的事实。实际上,在笔者访问的湖北农村,外出务工或经商早已是人所共知的通往富裕之门的捷径。在当地任何一个农庄,倘若村中有一户居民因外出务工或经商而致富者,其示范效应将会鼓励、带动村中每一个农户走出田野加入到城市的外来务工者行列。同目前仍然偏低的农业种植收入相比,外出务工或经商就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据调查,当地高达83%的农户家庭都有外出务工或经商的经历。

另一方面,当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务工者行列时,他们目睹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对政府的执政行为和执政水平就有了更高要求。这样,收入愈高的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较早外出务工或经商者,或者是那些外出务工或经商者中的成功人士),对基层政府执政水平的要求愈高。这在基层政府执政水平没有提高或提高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更不用说执政水平下降了),两者之间的差距就会加大,导致高收入者对基层政府不满意程度上升。因之,本模型中出现的AIN系数估计值为正的情形,表明了基层政府的执政水平已不能适应农村居民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要求和期望,这就是本模型给我们的其中一个深刻启示。

(3)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大小的比较。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在所有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中,PEI的系数值最小且不如其他系数估计值显著。它们之间的大小关系如下:

DPR的系数估计值 > BIP的系数估计值 > AIN的系数估计值 > PEI的系数估计值

这表明,在农村居民看来,政策落实程度(DPR)对评价基层政府的执政行为具有最大的权重,其次是政府承诺的信任指数(BIP),再次是人均收入(AIN),最后才是政策对收入的影响(PEI)。我们知道,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或经商而非农业种植,在评价基层政府的执政行为方面,后面两个解释变量(AIN和PEI)的作用不能同前两者(DPR和BIP)相提并论。因此,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方面,必须着眼于依法行政,提高政策的可信性,这是本模型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

四、关于理论和政策的几点启示

早在20世纪前半期,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新民主主义论》(1940)等系列论著中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不再进行“革命”了,但“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依然是中国的基本问题”(温铁军,2001)。

本文的问卷调查分析,描绘了一幅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生活状况的现实图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初期,广大农村居民在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改革中释放出巨大的活力。随着由农村到城市、由沿海到内地、由重点突破到全面推进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成了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不可避免的改革攻坚战役。尤其作为我国粮

食主产区的中部地区农村,其“三农”问题存在着别于沿海、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特殊性,忽视这种特殊性就会导致一项好的政策或措施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实博弈中变得丧失功效甚至完全不可行。

上述分析,为构建和有效缓解乃至最终彻底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和政策的基本框架:(1)在经济转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和社会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期间,政府主导性、市场自发性和社会法制性的均衡和妥协,必须维持在一个社会各利益主体和利益阶层都能接受的均衡范围内。政策的合理制定、有效实施、客观评估和及时反馈,是体现政府执政能力、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前提。(2)任何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或措施,必须着眼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因此,取消农业税、建立符合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需要的农村基本医疗保健和养老保险体系,是其中一个十分必要的制度性安排。(3)在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政府需要大力提升农村居民的知识结构和文化水平,强化其主体意识、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以降低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的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和谐。

依据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政府政策的博弈特征,并联系中国现阶段在解决“三农”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政策性思路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1. 实现治道变革,重塑政府现象,切实提高农村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法谚有“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超越了中国历史的所有时代。面对这样规模的制度创新,我们必须依靠法治来限制和约束政府权力,并尽可能保持政府政策的动态一致,以期最大程度地保障农村居民的利益。

2.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公共物品(包括公共服务)的规模和水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都与农村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密切相关。要在不断改进和提升现行水利设施、道路交通、电力通讯的基础上,实施农村基本医疗保健、中小学义务教育、优生优育和环境保护的配套改革,缩小城乡差距,以公共物品的发达促进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根本性提高。

3. 在大力推进城镇化水平的基础上,探索适合现阶段我国国情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城镇化和农地制度改革,是有效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两个相互依赖性条件,二者不可偏废。城镇化的水平和速度,为深化农地制度改革提供了现实的可能;而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式和途径,同样深刻影响了城镇化的规模和速度。因之,“三农”问题解决的程度和速度,取决于城镇化水平,这是政府在制定“三农”政策时必须予以关注之处。□

参考文献:

1. 刘树成,李强,薛天栋.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研究[M].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
2. 谷书堂,唐杰.我国的区域经济差异和区域政策选择[J].南开经济研究,1994(2)
3. 袁钢明.地区经济差异与宏观经济波动[J].经济研究,1996(10)
4. 魏后凯.中国地区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J].中国工业经济,1997(3)
5. 于祖尧等.我国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研究[J].管理世界,1997(2)
6.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M].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
7. 蔡日方,都阳.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趋同与趋异?对西部开发战略的启示[J].经济研究,2000(10)
8. 蔡日方,王德文,都阳.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区域差距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1(2)
9. 刘强.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分析[J].经济研究,2001(6)
10. 郭克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问题与出路[J].中国社会科学,2000(3)

11. 刘克茵, 张桂文. 中国“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考与对策研究. 管理世界. 2003(5)
12. 黄文平. 信用经济与政府责任 [J]. 学术月刊. 2002(4)
13. [美] H· 钱纳里, S· 鲁宾逊, M· 塞尔奎因, 吴奇译.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M]. 中译本, 上海三联书店, 1989
14. Barro, R. J. & Sala-i-Martin, Xavier, 1992(A), “ Convergence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100n2(April), pp. 223~ 251
15. Barro, R. J. & Sala-i-Martin, Xavier, 1992(B), “ Regional Growth and Migration A Japan-United States Comparison ”,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 v6n4(December), pp. 312~ 346
16. Jian, Tianlun & Sachs, Jeffrey D. & Warner, Andrew M. , 1996, “ Trends i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 NBER Working Paper No. W5412, Issued in January
17. Sala-i-Martin, Xavier, 1994, “ Cross-sectional Regressions and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8, pp. 739~ 747
18. Sala-i-Martin, Xavier, 1996, “ Regional Cohesion : Evidence and Theories of Regional Growth and Convergence ”,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40(June), pp. 1325~ 1352

注 释:

- ① 数据来源, 根据 1986~ 2004《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 ② 数据来源, 根据 1990~ 2004《中国统计年鉴》和《湖北省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 ③ 根据 1986~ 2004《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整理
- ④ 这里的地方政府, 仅指我国乡镇一级政府。 问卷内容所及的绝大多数问题, 都只与乡镇一级的政府相关, 个别问题, 可能涉及到市县一级。 由于农村居民, 尤其是种地务农者, 与乡镇以上更高级政府接触的机会很少, 鉴于此, 笔者就将调查内容和范围限定于乡镇级政府执政施政情况的层面。 事实上, 乡镇级别的政府是政府行政分级的最后一级, 亦是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核心, 其执政的能力和水平关乎到我国“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
- ⑤ 在调查过程中, 少数农民对笔者的调查不信任、怀疑甚至讥讽的态度。 他们怀疑对自己的调查会带来不利的后果, 害怕讲出实情会遭受地方政府官员的打击报复。 此外, 他们也不愿意公布真实的收入, 担心“露富”引来周围人的妒忌和仇视。 经过笔者的耐心解释, 乡亲们对笔者的调查都还比较配合, 能基本讲出实情。 据乡亲们透露, 就在笔者调查之前, 有一群外国人也对当地进行了类似的调查和访谈。 这是该地区几十年来仅有的两次田野调查。
- ⑥ 为保证调查结果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本次调查采取随机取样的形式, 事先并不设定访谈对象的身份。 实际上, 这次调查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农民, 他们或者从事农业种植, 或者进城务工, 或者从事乡村教育。 由于农村的学生, 除学习任务外, 上课之余或放假期间, 都要分担家务和从事力所能及的农活, 故他们对农村政策情况往往比较熟悉; 乡镇或村级中小学校的教师, 无论属于公办 (国家正式教师编制) 还是民办 (国家聘请农村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农民担任乡村教师以补充师资之不足), 都对农村情况甚为了解; 而那些在城市工作退休后返回老家 (落叶归根) 的人, 对城乡差距和乡镇政府的执政情况有更深入的把握。
- ⑦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04》